

## 論余英時的兩個世界

● 陳方正

個多月前，余英時先生忽然間走了。他年事已高，而且很有福氣，安詳離世，但事先沒有任何朕兆，大家的驚愕、傷感、難過都自所難免。我尤其如此，因為他在一睡不醒之前的幾個小時還和我通電話，短短幾天之後，我就突然接到余夫人的電話，說他已經入土為安了。當時真是驚駭莫名，百感交集，所謂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滋味，都一起湧到心頭。而直至如今，英時兄已經走入歷史，再不會如常和我們談笑，為廣大讀者論述歷史這個事實，也仍然好像十分虛幻。

我和英時兄有緣相識甚早，至今已經足足一個甲子。然而，我們經常遠隔重洋，雖然不時保持聯繫，相聚時日其實很少，算起來才不過三四年而已，甚至文字上的來往也很稀疏，只是到了最近十幾年，方才略有增加。因此我對於他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沒有系統的閱讀和觀察，說不上全面或者深入；所以這裏的討論主要是基於我們早年的平行經歷，以及我對他的關注而已。

### 一 生命中的關鍵時期

對於英時先生我有兩個基本看法。首先，他的人生觀、世界觀、事業取向等等，是在相當早的階段，大致不超過而立之年，就已經形成並且定型，此後不曾再有重大改變。其次，借用他那篇有名文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題目，我們可以說，他自己也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學術研究的世界，也就是他倘佯其中，樂而忘返的中國歷史探索；另一個則是現實批判的世界，也就是他往往不能自己，奮筆疾書的當代中國評論。這兩個世界相對獨立，但並非完全隔離，彼此之間不時會出現微妙的互動。換而言之，他這兩個世界在弱冠之初就已經決定下來，此後雖然逐步擴大和深化，卻始終穩

\* 此文本為2021年9月4日在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舉辦網上「余英時紀念論壇」上的發言，嗣經修訂。

定，再也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樣，他很早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那是他能夠獲得巨大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讓我進一步解釋以上的看法。要了解余先生的人生是如何形成，最可靠的線索無疑是他最後發表的著作《余英時回憶錄》<sup>①</sup>。這本自述為我們詳細剖析了他早年的三個時期，即潛山時期、動亂時期和香港時期。由於抗日戰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1937-1946)是在穩定但閉塞的安徽潛山官莊鄉度過，雖然夙慧早顯，但所接受的大體上只限於傳統教育，見聞也十分有限。至於青年時代(1946-1950)則正好碰上國共內戰，所以被迫輾轉於安慶、南京、北平、瀋陽、上海、北平之間，飽受兵荒馬亂之苦，以及學生運動和各種思想的衝擊，其間雖然曾經在瀋陽短暫入讀中正大學，然後又讀過半年燕京大學，但由於時局動盪，自然不可能潛心用功，思想上更是無所適從。

接着，他在1950年從北京到香港探親，然後戲劇性地選擇回到香港定居<sup>②</sup>，在隨後五年(1950-1955)間他的境遇就完全不一樣了，那可以說是奠定他一生基礎的時期。首先，這是他成年之後初次得嚐家庭溫暖，並且能夠在一個雖然艱苦卻相當穩定的環境中成長。其次，他父親余協中是知名的西洋史教授，而且和新亞書院創辦人錢賓四(錢穆)先生相熟，因此到香港之後不久，他就進了新亞書院，成為這位當代大儒最器重，也最悉心培育的入室弟子。從師生兩方面看，那都可謂難得的相遇和緣分。當時的新亞書院雖然處於極度困窘的時期，卻有強大的理念在背後支撐，所以不久之後就因為得到耶魯大學的雅禮協會援助而穩定下來，並且進一步開辦新亞研究所，使得他的學業能夠拾級而上，不致中斷。第三，同樣重要，但往往為人忽略——其實是不大為人所知的則是，在此五年間他並非長日埋首故紙堆中，而還有無窮精力去涉獵大量西方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同時探索新思想、寫文章、出書、辦報、編雜誌、搞出版社，成為一位最活躍的年輕文化人。當時他不但和友聯出版社以及《中國學生周報》、《民主評論》、《自由中國》、《人生》、《自由陣線》、《祖國周刊》等五六份刊物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且更曾經和朋友一道創辦高原出版社和不定期的《海瀾》雜誌<sup>③</sup>。

換而言之，他日後的兩個世界正就是在這五年之間逐漸建立起來：中國歷史研究的世界是在新亞書院以內，錢夫子的循循善誘之下形成；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則是通過自發學習，以及他和所謂「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sup>④</sup>的相互碰撞、激發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的，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的，兩者之間是互補而又互相促進的。

## 二 作為根源的50年代香港

我自己也是在50年代香港成長，而且時間比他長了幾乎一倍(1949-1958)，所以很熟悉那個非常特殊的環境。整體而言，香港此時的處境可謂

風雲突變，內外交困：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未久，它的經濟尚在掙扎復原，而大陸已經變色，大批難民湧入，人口在五年間(1945-1950)從五十萬驟增至二百二十萬，這對社會整體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以及所產生的混亂可想而知；更何況，它還要同時承受各種巨大外力的擠壓。在此情況下它不但維持穩定，還能夠緩慢發展，那委實是個奇迹，英國殖民統治手腕之高明亦於斯可見。

所謂外力，首先就是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它本來隨時可以收回香港，卻願意讓它維持現狀，主要是為了留下一個對外貿易的窗口，這在1950年6月(那正是余英時最後決定留在香港之時)韓戰爆發之後尤其重要；但除此之外，它自然還要在市民之間宣揚愛國思想，吸引優秀學生回國參加建設。英國人要維護其統治權威，但又不能夠得罪中國，首先就得對大量走私活動視而不見，也就是得頂住其「老大哥」美國的壓力，對聯合國的戰略物資禁運決議陽奉陰違，同時也不能夠過份壓制左派工會和報章的宣傳。

第二個外力則是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它不但和流亡到香港的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有千絲萬縷關係，而且還通過他們所辦的報刊(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時報》)來影響輿論，以及通過派遣特工來挑動逃港難民的反共情緒，這甚至曾經在1956年釀成巨大暴動。所以英國人既要利用他們抗衡中共的輿論和影響力，卻又不能過份縱容他們，要維持一個相當微妙的政治平衡。

第三個外力則是英國的盟友美國。它一方面不斷催迫香港政府堵塞中國輸入戰略物資的渠道，另一方面還有更長遠的戰略目標。就政治而言，這是在國共兩黨以外培植所謂「第三勢力」；就文化而言，則是大力資助教育和出版活動，以培植自由民主思想來對抗共產主義。而這正正就是當時流亡到香港的知識份子何以在謀生不暇之際，居然還能夠發展出一個蓬勃活躍文化社群的基本原因。例如，崇基、新亞、聯合這三所中國人自己開辦的書院，亦即日後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最初都是得到多個美國「非政府」組織例如紐約的中國基督教聯合會、雅禮協會，還有亞洲基金會、孟氏教育基金會等的大力支持，這才能夠立足和發展的。亞洲基金會所直接和間接資助的，並不止於上面提到的許多與英時兄有關的雜誌和出版社，而還有《人人文學》、《大學生活》、《自由學人》、《現代學術季刊》等文藝性和學術性刊物；大量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歷史學和政治思想書籍；以及許多中國流亡學者的著作，諸如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牟宗三的《認識心之批判》、錢穆的《人生十論》、勞思光的《康德知識論要義》等等，它們到現在都還在我的書架上。

所以，對英時兄而言，50年代香港有無比的重要性，因為他的兩個世界正就是在那個非常特殊的環境中孕育出來。從此看來，美國當時所推行的文化戰略是極其成功的，像余英時這位傑出年輕學人的成長，正就是其最突出的例子。當然，資助教育文化還只不過是這個戰略的前半而已，它的後半則在於和美國鼓勵移民和提倡多元文化的立國精神相銜接。英時兄後來通過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去了美國，在劍橋的優良學術環境安頓下來，發展成為拳

拳服膺於西方自由理念且有巨大影響力的華裔歷史學家，那才是這個戰略所結出來的美好果實。英時兄的名言「我在哪裏，中國文化就在哪裏」好像很獨特，其實也只不過是那種精神的一種表現而已。

### 三 穩定有序的人生

在1955年到了劍橋之後，英時兄的事業就可謂一帆風順，一往無前，此後碰到的唯一挫折，就只有1973至1975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的校長，由於主持大學改制小組，而飽受新亞元老和校友攻擊，心靈大受創傷那段經歷，但這也就堅定了他留在美國發展的決心。此事我已經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分析，這裏不再重複了<sup>⑤</sup>。

那麼，在此後長達一個甲子的學術生涯（1961-2021）裏，余英時的兩個世界究竟是如何發展的呢？相信今後和這個話題有關的討論會很多，我要在這裏提出來的，仍然只是一個框架，一個粗略的看法而已。余英時先生基本上是一位相當保守的人，人生觀、世界觀既然已經在50年代確立，此後就再也不會有劇烈變動，而只有緩慢、逐步的發展。然而，他那兩個世界的發展歷程卻完全不是一樣的。簡而言之，他歷史研究的世界是通過不斷吸收各種西方學術觀念，以及深入發掘、梳理中國史料，而逐步變得更寬闊、豐富和深入；至於他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則是從堅定而沒有變動的基本觀念出發，來對不斷變化的時局作出回應，它雖然有一個逐步激化的趨勢，但基本形態則是不變的。以下我們提出這兩個世界的重要節點，來說明它們進程的概略。

### 四 歷史研究的世界

我們先談歷史研究的世界。首先，英時兄關注的歷史問題雖然很多，但始終是以中國思想史為核心，大體上從未超出其範疇之外，所以其著作的題材是相當集中的，這當是受了西方學術高度專業化的影響，和他的老師錢賓四先生，或者年紀比他長一輩的饒宗頤、何炳棣等都大不一樣<sup>⑥</sup>。至於上面所說，他視野的擴展和研究的深化，則可以從他下列四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看出來。

首先，他的《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可謂早期的代表作，由他在1956至1979年間所發表的四篇早期論文組成<sup>⑦</sup>。雖然「知識階層」這個觀念來自西方，書中又反駁了一位西方學者的論點，但此書幾乎全部是建築在傳統資料的考據、梳理、分析、討論之上，因此可以視為從傳統向現代史學轉移的開端。至於不到十年之後出版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

則開宗明義宣稱，其出發點就是韋伯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萌芽之間關係的論題。事實上，此書的核心便是要通過歷史考察來質疑韋伯「儒家不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的論斷」<sup>⑧</sup>。所以，無論就問題意識或者方法而言，它都可謂積極趨向和融入西方學術主流之舉，但似乎亦正因此而引起了相當的爭議。

至於他的晚年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2003)<sup>⑨</sup>，則可以說是積聚畢生功力之作。它有三個特點。第一，是返本歸源，雖然也偶一涉及，卻不再亟亟於援引西方觀念和方法。第二，是打破學者歷來以「經」也就是「道」為思想史核心或主要題材的慣例(其實這不僅僅限於當代，傳統所謂「學案」亦然)，而將思想和政治兩者放在同一層面結合起來討論，從而闡發內聖與外王這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這無疑是個創舉，對當代新儒家尤其產生了巨大衝擊。第三，他以過千頁、將近七十萬字篇幅，環繞一個中心議題來作細緻研究和立說。如此宏大的統一與有機結構在中國史學著作中可謂極其罕見，應該承認是個創舉。正所謂知丘罪丘，皆以《春秋》，我想後世對於先生的評價，毫無疑問，都必將以此為衡量標準了。

當然，他歷史研究的「收官之作」是最後發表的《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2014)，那也同樣重要<sup>⑩</sup>。倘若《朱熹的歷史世界》是宏大中見細密，則此書是深邃中見曲折。它應用西方學術中的「薩滿信仰」和「軸心突破」這兩個觀念來窮探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起源和發展的過程，亦即「天人合一」觀念從原始巫文化的「降神」逐步演變為孔、孟、荀、老、莊等抽象與個人化哲學思想的詳細歷程。在中國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個最重要的核心觀念，歷來論述文字多如恆河沙數，但能夠通過歷史資料，詳細而確切地闡明它最初的起源，以及其與各個演變階段中意義之關係者，當以此書為首。

我曾經在一篇隨筆中說：中國史學向來忌諱標新立異，而英時兄那本有關朱熹的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論天人之際》當然也一樣)和歷來觀念大相逕庭，他的嚴格與深入論證雖然令同行難以反駁，但是否能得其心悅誠服則尚未易言<sup>⑪</sup>。想不到我這些外行人的外行話居然也能得他肯首，被視為知言。這樣看來，他的名聲雖大，但他的歷史世界之被中國史學界真正接受，恐怕卻仍需假以時日吧。

## 五 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

英時兄的歷史研究是理智的、知識性的世界，至於他的當代中國批判則是感性的、發自肺腑的世界。我這樣說絕非意味他的批判不講道理，而是說它以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這個理念固定不變，不容置疑，一切皆從此出發，而背後的原始動力則以感情為主。他這種情懷自年青時代就已經定型，

後來則更由於時事的衝擊而繼續發展甚至激化。這可以從他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六四事件和經濟起飛這三件大事的反應看出來。

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轉捩點，自此它走上一條與從前迥然不同，以追求經濟發展為目標的道路，整個中國社會也因此出現了新氣象。許多海外知識份子興奮莫名，爭相回國參觀和交流。英時兄卻很冷靜，他回大陸唯一的一趟是1978年帶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到西北考察。此行他感慨繫之，腦際縈迴丁令威化鶴歸來的故事，心頭泛起「城廓如故人民非」的詩句，但敦煌詩作「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則道出了心情的底蘊：此行興致索然，更沒有歸家的感覺<sup>⑫</sup>。六四事件爆發之後他悲憤莫名，在題為〈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文章中斷言：「從一部中國史來看，二十世紀是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比之五胡亂華、五代十國、蒙古入主都更糟糕，而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以及邊緣人物之佔據中心，則是當代中國的特徵，因此「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大可能有光輝前景」<sup>⑬</sup>。他祝賀老師錢賓四先生九十大壽的詩句「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說得比較委婉<sup>⑭</sup>，但底子裏和上面的判斷並沒有甚麼分別。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經濟起飛，淩淩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科技經貿的發展也逼近西方世界，使得國人和海外華人倍感自豪；而與此同時，英美兩國的政治生態丕變，美國的兩黨對壘更令國家嚴重撕裂，因此他們的學者和評論家都開始為「自由民主體制」(liberal democratic order) 本身的深層缺陷而擔憂。然而，這些變化似乎也都沒有觸動英時兄的批判世界，沒有能夠使他重新估量和分析自己歷來對於自由主義和當代中國的判斷。我不曾仔細閱讀他就2010年代台灣和香港許多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談話、議論，但他的言論備受關注，傳播極廣，我從中所得到的粗略印象是，他的中國觀、世界觀即使在內心深處有微妙變化，也從來不曾影響他的立場，或者形諸文字。統而言之，他的西方普世價值觀或曰自由主義信仰非常堅定，是不可能為現實政治發展所動搖的。的確，沒有如此堅定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作為支撐，實難以想像他的當代中國批判世界如何能夠屹立數十年不變。

我十分慚愧，在英時兄生前從來沒有和他認真討論過彼此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這可以借用他談張光直政治取向時的話來解釋（雖然我本人和張光直的取向並不相同）：「我們早就清楚彼此的分歧所在，但從不曾發生過政治爭辯，這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捲入實際的政治活動……我一向尊重個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因此從來不想用論辯來說服異己者。」他跟着的幾句話更重要：「我對於自己所思所信也只能看作是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而不是人人必須接受的真理。不過這一價值取向則使我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sup>⑮</sup>這無疑就是他政治態度的最後表白，也是他那個批判世界高度穩定性之由來的最佳解釋了。

## 六 結語

對於中國來說，二十世紀是個天翻地覆的大變革時代，在其中每個人的命運都會由於際遇和個人選擇而大不相同。英時兄是幸運的，在一段狂飆激流般的經歷之後，他得以脫離漩渦，安身立命於美國東岸的常春藤盟校，成就了歷史研究世界中的大業。然而，遙望神州鉅變，他又往往自覺有如佛經故事中那隻「嘗僑居是鄉」的鸚鵡，雖然明知其不可，卻仍然要沾濕羽毛去撲救大火，由是而生出了他那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至於這是否真能感動天神為他滅火，或者此劫難最後到底應當如何消解，則他但求心之所安，是不再去詳細追問的了<sup>⑥</sup>。英時兄，願你在普林斯頓好好安息，我們將永遠懷念你，為你的歷史研究，為你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更為你堅定不移的信仰。我們深信，真摯的信仰縱然表面上千差萬別，至終仍將殊途同歸。

### 註釋

- ①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 ② 他自己強調，此是決定自己一生的關鍵時刻。見前引《回憶錄》，頁92-98。
- ③ 有關他這一段重要經歷見前引《回憶錄》，頁117-47。
- ④⑥ 見前引《回憶錄》，頁124；220。
- ⑤ 參見陳方正：〈相遇於命運的樞紐——談余英時、新亞書院與中文大學〉，《明報月刊》，2021年9月號，頁24-26。
- ⑥ 何炳棣與余英時的人生經歷非常相似，但何先生的學術研究卻橫跨社會史、史前史、思想史三個迥然不同的領域，甚至其還是以西洋史作為開端，這其中緣故我們不在此討論。
- ⑦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 ⑧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67-71。
- ⑨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與此鉅著密切相關的還有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它本是《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的「緒說」，但因篇幅太長，故此抽出來獨立成書，另加上最後一章以作結尾。
- ⑩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 ⑪ 陳方正：〈陳方正的書單〉，《南方周末》，2010年9月29日。
- ⑫⑬ 余英時：〈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談我的「中國情懷」〉，載《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375-81；379。
- ⑭ 余英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年12月號，頁5-7。
- ⑮ 該詩他親筆題於前引《回憶錄》的扉頁，可見是有述懷意義的。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